

復興崗學報

民 99，98 期，1-26

數位時代下的軍事傳播學研究

胡光夏

世新大學新聞系教授

陳竹梅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系講師

摘 要

軍事傳播學涵蓋了軍事與傳播，而軍事的研究是與戰爭是脫離不了關係。儘管衝突與戰爭與人類如影相隨，但有關軍事傳播的系統性研究卻一直到 20 世紀中期以後才開始大量的出現。

本研究採取文獻分析法，試圖對於在數位時代下的軍事傳播學研究作一檢視，藉以瞭解：軍事傳播學研究的發展歷程，以及其定義與研究範圍為何？是何種因素促成軍事傳播學研究內涵與範圍的改變？在數位化時代下，隨著傳播研究典範與理論的轉移，特別是傳統大眾傳播研究，對於軍事傳播學研究帶來了那些的啟發？隨著數位化時代的來臨，軍事傳播學研究的研究主題與面臨的挑戰有那些？

本研究計有五大單元，依序為前言；軍事傳播學的定義與發展歷程；傳播學術典範的發展與轉移對軍事傳播學研究的啟發與影響；數位時代下軍事傳播學研究面臨的挑戰；結論。

關鍵詞：數位時代、軍事傳播學、軍事新聞學、傳播學術典範、新聞產製

數位時代下的軍事傳播學研究

The Milita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Digital Era

Guang-Shiash H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hih Hsin University

Chu-Mei Chen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cademic field of military communication contains military and communication.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research and war. Despite the fact that conflict and war follow mankind every step of the way, much research did not appear until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By using documentary research method,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examine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what are the evolution, definition, and research areas of milita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What kind of factors facilitate the changes of nature and areas of milita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What are inspirations of transfer of communication paradigm and theory, particularly the traditional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n milita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digital era? In terms of coming of digital era, what challenges are faced by the milita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study has been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including introduction; the definition and evolution of military communication; the inspirations and influence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aradigm's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 on milita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milita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onclusion.

Key words : Digital era, military communication, military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aradigm, news production

壹、前言

軍事傳播一詞涵蓋了軍事與傳播，而軍事的研究是與戰爭是脫離不了關係，即使處於和平時期，建軍備戰的工作也持續不斷的在進行著。由此可知，瞭解軍事傳播學的研究，戰爭的相關研究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

衝突與戰爭就像人類的身影，一直跟隨著人類（倪樂雄，2002）。歷史家 Hobsbawm（1995:22）曾表示，我們對於人類 20 世紀的瞭解是無法脫離戰爭的，這個世紀「是由戰爭加以註記。縱使在沒有槍砲聲時，人們也是依照著戰爭來生活與思考」。在進入第二個千禧年之後的 21 世紀初始，和平曙光不僅未出現，甚至仍遙不可及。

20 世紀前半世紀發生了兩次人類歷史上最具有規模的毀滅戰，使得人們相當渴望和平，許多不同領域的學者包括政治學、法學、人類學、社會學、傳播學與經濟學等都紛紛投入和平的相關研究，使得和平研究成為一個跨領域的新興學門（葉德蘭，2003；胡光夏，2008）。儘管如此，過去的許多和平研究卻往往是從戰爭研究中產生出來的，研究的主題包括戰爭的本質、原因與終止戰爭的途徑等。

戰爭是人類社會暴力衝突的最高型態，可以在瞬間奪走人們的骨肉、親友與同胞的生命。對於未直接參與或捲入戰爭的人們而言，戰爭則時時刻刻的在覬覦人們的心智與「目光」。

在現代大眾傳播媒體出現前，人類主要是依賴口語與文字來述說戰爭「故事」。現代型式的報紙出現後，才開始有專業的戰地記者來報導衝突與戰爭的新聞。對於新聞產製者而言，傳播科技的發展與運用，深切的影響新聞守門人對於軍事新聞的報導，特別是戰爭新聞的再現。胡光夏（2004、2005、2007）曾依照傳播科技的發展歷程，將媒體報導戰爭的歷史區分為：平面媒體的戰爭報導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電視戰爭報導時期（越戰時期的報導）、衛星與有線電視報導時期（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的報導）、電視直播與網際網路的報導時期（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的報導）。2003 年第二次波斯灣戰爭不僅延續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的「傳播戰爭」、「資訊傳播技術戰爭」與「智慧武器戰爭」，更創下了網際網路大規模參與戰爭的報導（胡光夏，2007）。而網際網路的時代也意謂著數位時代的報導已成為一種普遍的趨勢。

對於戰爭的決策者與發動者而言，每一種「新」傳播媒體的誕生，都意謂著可以作為戰略與戰術的新工具，也是遂行心理戰與宣傳戰的好幫手。Hiebert（1995）就認為，大眾傳播媒介是現代戰爭中的基本要件之一。

儘管衝突與戰爭與人類如影相隨，但有關軍事傳播的系統性研究¹卻一直到 20 世紀中期以後才開始大量的出現。事實上，不只是作為傳播研究次領域的軍事傳播研究出現的晚，就連傳播（特別是大眾傳播）的相關研究也是在 20 世紀初期才開始浮現。Benard Miege（陳蘊敏譯，2008）曾指出，在人類的歷史上，傳播是一種相對比較新的功能，其取得學門自主的地位的時間很短，因此，可能會遭到誤解與否認。Miege 更進一步指出，在許多的國家中，傳播僅等同於大眾傳播媒介研究、廣告研究、公共關係研究與民意研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因為在當代，幾乎所有不同的社會領域，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涉及了傳播。在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新聞的論述中，都與傳播有著緊密的關係。

本研究就是在此一種背景下，採取文獻分析法，試圖對於在數位時代下的軍事傳播學研究作一檢視，藉以瞭解：軍事傳播學研究的發展歷程，以及其定義與研究範圍為何？是何種因素促成軍事傳播學研究內涵與範圍的改變？在數位化時代下，隨著傳播研究典範與理論的轉移，特別是傳統大眾傳播研究，對於軍事傳播學研究帶來了那些的啟發？隨著數位化時代的來臨，軍事傳播學研究的研究主題與面臨的挑戰有那些？

正如方鵬程（2005：17）所指出的，「迄今軍事傳播的探討或研究，或可謂處於起步或是拓荒的階段，或對此仍有保留，是否有必要加以界定或獨立成為一個學門，尚屬仁智互見」。但從國內外的相關研究文獻的逐漸累積，無疑的，作為傳播學領域的次學門——軍事傳播學已逐漸吸引來自不同領域學者的加入，特別是在強調「反恐戰爭」的 21 世紀初始之際，期待本研究的研究成果能奉獻一己之力。

本研究計有五大單元，依序為前言；軍事傳播學的定義與發展歷程；傳播學術典範的發展與轉移對軍事傳播學研究的啟發與影響；數位時代下軍事傳播學研究面臨的挑戰；結論。

貳、軍事傳播學的定義與發展歷程

就如同傳播學研究一樣，最早是從新聞學研究逐漸擴展到大眾傳播學的研究，要瞭解軍事傳播學也要先從軍事新聞學的定義與發展來加以瞭解。

（一）軍事新聞學的建立與發展

在現代型式的報紙媒體出現之前，東西方有關戰爭的報導或記載主要是以官

¹ 事實上，口語傳播或語藝（Rhetoric）的研究已有很長的歷史，此處作者應該是指透過傳播媒體中介的傳播。

方或參戰者的目擊來加以撰寫（胡光夏，2007）。一般大都認為，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是開啟平民報導戰爭的先河（Hiebert, 2003），而參與報導該戰役的英國《泰晤士報》（*Times*）記者 William Howard Russell 被認為是現代戰地記者先驅者之一（胡光夏，2007）。因此，軍事新聞學的研究可以說是從克里米亞戰爭開始。也就是說，軍事新聞學的發展與戰爭的報導有著密切的關聯。

軍事新聞學一詞的英文是「Military Journalism」。基本上，是以傳統新聞學門冠上軍事一詞。因此，軍事新聞學是新聞學與軍事相互重疊的一門學科。

在以往，由於軍事新聞傳播現象具有特殊性，軍事新聞研究的高難度，以及軍事新聞研究成果的相對狹隘性等因素，投入此一領域的相關研究較為稀少。童兵（2000）曾指出，中國在抗日戰爭前後，才開始有人從事軍事新聞學的研究。

1938 年以前，與軍事新聞學相關的專門著作僅有梁士純於 1936 年出版的《戰時的輿論及其統制》。此後至 1944 年間，相關的著作陸續出現，如 1938 年出版的五本著作，任華明的《戰時新聞學》、張友騫的《戰時新聞紙》、趙超構的《戰時各國宣傳策略》、王新常的《抗戰與新聞事業》、中國青年記者學會的《戰時新聞工作入門》，孫義慈於 1941 年出版的《戰時新聞檢查的理論與實務》，田玉振於 1944 年出版的《戰時新聞工作的途徑》（童兵，2000）。

這些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版的軍事新聞的相關著作，主要都是以戰時的新聞與傳播問題為研究的重心，較少觸及軍事新聞的平時工作。

國民政府自從播遷來台後，有關軍事新聞學的相關著作也較為缺乏，相關的理論與實務工作技能的傳授，主要是由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聞學系的前身政治作戰學校新聞學系在遂行，曾先後編撰了一些教材，但教授的重點主要仍著重在傳統的新聞學領域中。

海峽對岸的中共，對於軍事新聞學的相關研究顯得較為積極，相關的軍事新聞學著作於 1980 年起，陸續出現。

1988 年由毛文戎與史文亭共同撰寫《軍事新聞學簡論》一書。該書同時涉及時與戰時的軍事新聞傳播問題，內容包括：軍事新聞的黨性和使命、衡量軍事新聞的尺度、拓寬軍事新聞報導面、軍事新聞的宏觀信息、訓練報導、軟科學報導、軍事新聞的對外報導、語言特色、典型報導及其連續、軍事新聞的採訪和時效性、軍事新聞工作的基本素質等。

1991 年展江與楊魯江共同出版《新聞與戰爭》。1999 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展江的博士論文《戰時新聞傳播諸論》由經濟管理出版社出版，內容著重在從古代至 1991 年波斯灣戰爭期間的戰時新聞傳播實踐及其發展脈絡、戰時新聞傳播與社會演進的關係、以及其不同於和平時期新聞傳播的種種規律等（童兵，2000）。

2000年由南京政治學院軍事新聞學系的盛沛林教授等人共同撰寫《軍事新聞學概論》一書，是中共第一本對軍事新聞事業、軍事新聞工作與軍事新聞現象，較為有系統論述的著作。該書除緒論與結語外，計有十六章，內容涵蓋：軍事新聞定義的界定、軍事新聞特點的闡釋、軍事輿論導向與軍事輿論監督、軍事新聞的黨性與群眾性原則、軍事新聞傳播受眾的類型與特點分析、軍事典型報導、軍事新聞指導性與真實性原則、軍事宣傳謀略與策略、戰事新聞傳播與新聞事業、戰事新聞傳播法則、軍事新聞工作者的素養等（盛沛林編，2000）。

在中國大陸所出版的這些軍事新聞學的相關著作中，內容雖然觸及一些在平時與戰時，軍事新聞的一些基本概念與實務工作等方面，但其所強調的軍事新聞學，是著重在黨性、指導性、群眾性與宣傳性等特質。中國大陸為了落實軍事新聞的教育訓練還特別在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成立軍事新聞學系。

台灣建軍備戰思想與戰略的主要來源的美國，美國在民間大學方面則有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設立軍事視覺新聞學學程（programs），該學程區分為軍事攝影學（military photojournalism）與軍事動畫媒體（military motion media）等兩種專長課程，主要是訓練在雪城大學的預備軍官訓練團的學生。

從上述的探討，可以瞭解到，早期中文有關軍事新聞學的研究是著重在戰爭時期為主，近期則開始著重在基本理論架構的建立，探討的重點涵蓋平時與戰時，研究的成果也逐漸展現出軍事新聞學門的研究特色，並逐漸與傳統新聞學有所區隔。

（二）軍事新聞學的定義

軍事新聞學是屬於新聞學的一個次領域，主要是以新聞學為基礎，將相關的理論與實務工作運用於軍事方面。新聞學是一門研究新聞傳播現象、新聞傳播事業、以及新聞與社會互動的學門；軍事新聞學則是一門研究軍事新聞傳播現象、軍事新聞傳播事業、軍事新聞工作、以及軍事新聞與社會互動的一個學門（盛沛林編，2000）。

早期的軍事新聞學僅涵蓋傳統的新聞學內容，然隨著傳播科技的發展與時代的變遷，以及大眾傳播學門的興起，特別是廣告與公關產業的蓬勃發展，軍事新聞學的內涵也不斷的在擴充，將以往僅著重在軍事新聞的採訪、編輯、發行、對媒體關係，以及文宣工作的推展等，擴展至危機的處理與應變、議題管理、雙向溝通等。

（三）軍事新聞學的內涵與範圍

從以上軍事新聞工作的發展與演進、軍事新聞學的相關著作、以及軍事新聞的定義與目的等的內容探討，可以瞭解到，軍事新聞學是新聞學的一個分支學門，是針對平時與戰時的軍事新聞工作、軍事新聞事業、軍事新聞傳播活動等的

基本理論與實務的綜合論述與研究。

軍事新聞學的範圍涵蓋：軍事新聞採訪、軍事新聞寫作、軍事新聞攝影、軍事新聞事業的經營與管理、媒體聯繫、軍事新聞法規、危機管理、軍事議題管理、軍事評論寫作等。

二、軍事傳播學的定義與研究範圍

(一) 軍事傳播學的定義

軍事傳播學是一門科際整合的學門，主要是由軍事學與傳播學、新聞學所構成，但卻與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政治學與社會學等不同學門有著密切的關聯。

如上文所指出的，先有軍事新聞學再擴展成軍事傳播學。以美軍為例，早期的軍事新聞工作著重在公眾宣傳 (Publicity)，後來逐漸擴展為公共事務工作，涵蓋的內容除了傳統的軍事新聞工作外，包含對內溝通、媒體關係與社區工作等三大項，這些的工作範圍早已超越了純粹的軍事新聞報導的實務與理論。

方鵬程 (2005: 6) 將軍事傳播界定為是「軍隊、軍事單位或軍人所進行有關的溝通、宣傳及媒介傳播等的理念、工作與實務」，其具體的涵蓋層面包括：軍隊內部的傳播工作、軍中文宣、軍隊與媒體關係、軍隊對媒體傳播的運用，以及軍隊的公共事務等。

傳統上，軍事傳播的主要傳播者是政府、國防單位、軍隊與軍人 (方鵬程等，2005)。除此之外，軍事傳播與大眾傳播的主要另一項差別是傳播的目的。軍事傳播的主要目的是以國家利益為主 (方鵬程等，2005)，而大眾傳播的目的主要則包括商業與公共利益。軍事傳播作為一種軍事戰略與戰術則是一種精神戰力的經營。

方鵬程 (2005) 的定義主要是將軍事傳播的主體定位為是政府與國防軍事單位與人員。而軍事傳播的目標可區分為四個主要對象：內部受眾、社區民眾、一般社會大眾、以及特定受眾。內部受眾包括現役軍士官兵、文職聘雇人員、退除役官士兵與後備軍人等。社區的民眾則是部隊駐紮地區附近的民眾。一般社會大眾則不僅是官士兵的主要來源，同時也是納稅人的角色，不僅是全民國防需要民眾的支持，民意也會影響國防的決策。特定受眾則是經挑選過的對象，如地方意見領袖、各級民意代表等。

然而，在網際網路與數位的時代中，此一定義可能會面臨到一些挑戰。主要的原因是包括仍沿用舊的傳播學典範，採取從上到下的傳播方式，且著重在宣傳、說服與民意經營等層面。在數位時代中，傳播者與接收者的界限已經模糊不清了，再加上傳播科技的匯合、數位內容的匯合等變化，必須有不同的思維方向。

(二) 軍事傳播學的內涵與範圍

軍事傳播學除了涵蓋傳統的口語傳播外，還包括大眾傳播。大眾傳播是由英文 Mass Communication 一詞直接翻譯而來。大眾傳播是指利用傳播工具，將一定的意識內容，傳播給社會大眾的一種行為（鄭貞銘，1975）。

大眾傳播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新傳播媒體，如廣播與電視等的逐漸普及後，才興起的一個學門。大眾傳播研究的範圍通常是以美國的傳播學者拉斯威爾（Harold D. Lasswell）的傳播模式：「誰說什麼 透過何種通道 對誰說 達到何種效果」（Who says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and with what effect）為基本範圍。依此一模式，其研究的內容包含：傳播者的研究、傳播內容分析、傳播媒介與傳播過程分析、閱聽眾研究、以及傳播效果分析等。

大眾傳播學的研究則包括傳播者的動機研究與傳播組織、傳播內容、傳播媒介、傳播過程、閱聽眾、與傳播效果的綜合研究等（李瞻，1972）。基本上，大眾傳播學在一些批判理論，如文化研究、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等的加入後，其研究的領域也擴展至研究大眾傳播媒介與整體社會中的其它機制的互動與互動所產生的相關問題，以及階級、性別、種族等層面的議題。大眾傳播學門的研究是一門科際整合的學門，必須具備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統計學等的基礎，而在批判理論興起後，大眾傳播學又與文學、歷史學等學門，有著密切的關聯性。

在從事軍事傳播研究時，有三個基本的分析層面：傳播內容的產製、內容、以及閱聽眾的接收。在網際網路時代中，這三個層面是以動態的方式變動與運作的（Oates, 2008:158）。

方鵬程（2005）主張軍事傳播探討的主題應涵蓋了內部成員關係、社區民眾關係、一般民眾關係、政府跨部門間的橫向與縱向關係，以及國際間的關係等。在這些主題中，新聞傳播媒體是最值得注意的焦點，不論在戰時或平時，媒體關係的經營與管理就顯得特別的重要。

軍事傳播學的媒體層面研究包括：可以控制的媒體與不能控制的媒體。可以控制的媒體是指由政府或軍方所出資或籌辦的媒體，包括對內溝通與對外溝通的媒體。不能掌控的媒體是指商業經營或私人所擁有的媒體。

由以上的探討可以瞭解到，如以政府與國防軍事單位與人員為軍事傳播的主體，軍事傳播除了涵蓋傳統的軍事新聞學外，還包括了公共關係、民意與國際關係等領域。

總結，軍事新聞學在研究範疇上，比新聞學與軍事傳播學要來的窄，主要是著重在與軍事有關的新聞活動，可以說是，屬於新聞學的一個次領域。軍事新聞學從新聞學汲取了新聞工作的理論與實務、新聞事業的經營與管理、新聞與社會

的互動等概論與實務的知識。軍事傳播學則除了涵蓋軍事新聞學外，也從大眾傳播學門吸取了廣播與電視等電子媒體的相關理論與實務、廣告與公關產業的相關技能與知識、以及傳播活動與社會的互動等。

三、影響軍事傳播學發展的因素

Oates (2008) 曾歸納出在民主政治的體制中影響戰爭新聞的因素包括：全球的政治情勢、菁英對衝突的形塑、軍隊的資訊管理、衝突的地點、衝突的時間、媒介體系、記者的自我認知、以及新傳播媒介等。

Oates 的觀點主要是針對影響戰爭新聞產製的因素所歸納出來的，而在上文中已指出，軍事傳播學是從軍事新聞學擴展而成的，且戰爭與此一學門的發展息息相關。

軍事的競爭與對抗可以說是新傳播科技的主要孕育者與催生者之一（胡光夏，2007）。Mattelart（陳衛星譯，2005）認為，從歷史的角度來檢視傳播（特別是國際傳播）的發展，其中交織著戰爭、進步與文化，以及三者間連續不斷的相互交錯軌跡。傳播除了被用來進行戰爭外，在和平時期也激發出對傳播本身的研究與分析，並且將研究成果運用於軍事服務。從電報、無線電廣播、衛星通訊技術與網際網路等，就可以瞭解到這些現代的「新」傳播科技都與軍事有著密切的關係。

Louw（2003:220）認為，現代的傳播媒介本身已成為一種衝突的舞臺（The media as a theatre of conflict）。媒體成為當代衝突的手段與工具，主要是經由兩組不相關的思潮與情事所構成的。首先，如後現代主義者 Baudrillard（1995）所宣稱的，波斯灣戰爭是一種重大虛擬（gigantic simulation）的戰爭，人們是被電視影像所轟炸，而不是飛彈。其次是，科技發展所促成的「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RMA)，也就是戰爭的本質已逐漸成為科技化（technologized）、資訊化（informatized）、中介化（mediated）、數位化（digitalized）。

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瞭解到，武器與通訊傳播科技發展是促成改變的最重要兩個因素，以下分別加以探討。

（一）戰爭型態的改變

Alvin Toffler 與 Heidi Toffler（傅凌譯，2003）在其所著《新戰爭論》（*War and Anti-War*）一書中，將戰爭的型態分為三波：農業、工業和資訊。俄羅斯的軍事理論家如斯利普琴科則以戰爭的起始年代、武器系統、主要能源、戰術和特點等，將戰爭型態的演進區分為六代：冷兵器、火器、近代火器、機械化、核戰爭和資訊化戰爭（轉引自王凱，2000：4）。Webster（2003）將現代戰爭類型區分為兩

種型式：工業戰爭（industrial warfare）與資訊戰爭（information warfare）。工業戰爭的期間是從 1914 年至 1970 年代，1970 年代以後則屬於資訊戰爭。

Webster（2003）指出資訊戰具有六項特點：戰爭不再需要大規模的人力，而是以「知識戰士」（knowledge warriors）來處理複雜與電腦化的武器裝備；戰鬥單位已轉變成次要角色，而由更專業化與科技化來取代；軍事武裝衝突是一種「立即性戰爭」（instant wars）（Castells, 1996:454-461），正面的遭遇戰會很短暫，可能僅有數天或者數週之久；資訊戰並不需要很多的詳細計劃，而是需要嚴密的與彈性回應的計劃；減少平民對戰爭的參與，而依賴專業知識戰士；資訊戰注重國內與全球民眾的「感知管理」（perception management）。

資訊戰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數位化與電腦化。由於戰爭的型態改變了，也促成了軍事傳播學對於傳播者、傳播通道、接收者等傳播要素的不同思維。

（二）「新」媒體的出現

基本上，不同時代中各種「新媒體」的出現，都會對於新聞產製的概念、形式與技術等帶來一些衝擊，也因而促使新聞傳播領域的理論與實務不斷的擴展與充實。

隨著傳播科技在新聞採訪與寫作上的應用，新聞學的領域也從早期的報學，發展到後來的廣播學與電視學等。而從 1990 年代中期起，由於網際網路的興起，對於傳統新聞學的平面與電子媒體的劃分，帶來了很大的衝擊，更對傳統新聞媒體的經營者帶來了極大的挑戰。回顧傳播媒體的發展史，這似乎是每一種新媒體出現的必經歷程。

Virilio（1989:7）曾指出，「戰爭的歷史是一種視野快速改變的歷史。」從傳播媒介在戰爭報導中的應用，可以瞭解到隨著傳播科技的演進，在不同的戰爭中，傳播媒介所「中介」（mediated）或再現（represented）的戰爭景況，確實有著很大的不同。

新傳播科技的不斷出現，逐漸改變了傳播者與接收者的角色。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前新聞部總裁 Lawrence Grossman 在談到傳播媒體的發展對於閱聽眾的影響時表示：「印刷機讓我們通通變成讀者。影印機讓我們通通變成發行人。電視機讓我們通通變成觀眾。數位化網路則讓我們通通變成廣播員。」（轉引自蔡繼光等譯，2000：71）。

如果以 M. McLuhan（1964）所提出的「媒介就是訊息」，將媒介視為人的延伸，則隨著傳播媒介的演化與發展，戰爭報導所帶給我們的是符合人體的各種功能需求，分別是著重在眼睛（報紙、電視）、耳朵（廣播、電視）、腦（電腦網路）等。基本上，McLuhan 所提出的媒介進化歷程是從提供線性思考的印刷媒介，演進到影像流通世界的電視媒體，最後到衛星和數位網路的全球化與地球村（吳筱

攻，2003)。

隨著科技的發展與運用，戰爭本身在逐漸的改變中。在資訊戰爭中，其特點是廣泛的運用資訊和傳播科技於戰爭中，再加上對於媒體特別關注 (Webster, 2003)。Marshall McLuhan 在 1960 年代時就曾預言，未來的戰爭不再是傳統武器的地面戰，而是透過媒體所進行的影像戰(轉引自 Kamalipour, 2004: 92)。

新資訊科技影響戰爭資訊化主要在四個方面 (Louw, 2001:182-183): 首先，新數位科技產製出可以迅速終結戰爭的「聰明」殺人武器 (smart killing machines)。此一科技是資訊化的，能使戰爭看起來無血腥且乾淨清爽，完全符合公關的需求，也就是可以使戰爭看起來是像電玩遊戲戰 (video-game warfare)。

其次，就如同經濟已資訊化一般，戰爭也已資訊化。擁有數位新科技能使戰爭迅速結束的原因之一是，由於能透過數位科技蒐集到大量的資訊與情報，有利於指揮官對於實體與非實體軍事目標的決策作為。

再者，全球資訊網絡可以作為散佈假資訊與心理戰來擾亂敵人的有效管道，且可以即時的傳送外交訊息。最後，有能力發動資訊戰的已開發國家的人民已高度的「媒介化」(media-ized)，深深地會被媒體的影像所影響。在資訊戰中，一般民眾已不再是以兵士被徵召來參與戰爭，而是以戰爭的觀看者 (spectators of war) 被動員 (Ignatieff, 2000)。對於軍事的領導者而言，如果透過媒體的報導，而讓民眾看到戰場的傷亡場景，將可能會引發反戰的浪潮。

參、傳播學術典範的發展與轉移對軍事傳播學研究的啟發

促成軍事傳播學研究的改變除了武器與通訊傳播科技的發展外，傳播研究典範的轉移對於軍事傳播研究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與目的論等提供了不同角度的思維，更影響了研究的焦點與分析的架構。

胡光夏 (2007) 已指出，越戰前有關媒體與戰爭的相關學術研究文獻較為缺乏²，越戰之後，相關的學術研究才陸續的出現。越戰之後，也使美軍痛定思痛的進行公共事務的革新，因此，有關軍隊公共事務的相關研究也逐漸出現。這些變化使得軍事傳播研究的範圍逐漸的在擴展，然研究的重點仍著重在衝突與戰爭，特別是媒體在戰爭中的角色。

² 其中較廣泛探討且有用的書是由 Philip Knightly (1975) 所執筆的 *The First Casualty*，但此書並非從學術性的角度來加以探討 (Hallin, 1997:207)。

Hallin (1997:206) 將以往媒體與戰爭的研究歸納為三種研究取向：媒體與民意研究³、戰爭媒體社會學研究⁴、戰爭文化研究⁵。Carruthers (2000:11) 則將戰爭與媒體研究歸納為以下幾項：媒體在單一衝突或事件中的表現、戰地記者回憶與說明、軍事與媒體關係分析、戰時媒體應用（如宣傳戰、戰爭照片或影片）等。

Marwick (1977, 1988) 與 Hallin (1997) 認為，以往許多的經驗性研究大都缺乏與社會理論相結合，未將戰爭與戰爭的傳播對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影響、公共領域的結構或是政治文化與社會意識型態等加以討論。

在這些學者的歸納中，較為忽略的是有關傳播研究典範的檢視，特別是在 1990 年網際網路出現後，人類開始進入數位化逐漸普及的社會，不僅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更帶給學者對於原有學術典範與理論的適用性的反思。

本單元區分為三部分，首先檢視數位時代來臨，其次是傳播學術典範的轉移，最後則探討學術典範轉移對軍事傳播研究的啟發。

一、數位（第二媒介）時代的來臨

Holmes (2005) 指出，從 1990 年代的中期開始，有關網際網路的文獻開始大量的出現，使得「第二媒介時代」的概念獲得發展。Poster (2005) 所出版的《第二媒介時代》(*The Second Media Age*) 系統性的檢閱了這些文獻，並提出了對傳播科技與新傳播科技對社會進程的反思。基本上，第一媒介時代是指廣電媒體的時代，而第二媒介時代是指互動媒介的時代，主要是由網際網路所發展出來的傳播體系。

網際網路的發展是源自於 1950 年代的冷戰時期，美國主要是考量到國家安全、共產主義的擴散、前蘇聯於 1957 年 10 月 4 日成功發射 Sputnik 衛星、以及核子武器的潛在性毀滅等，而加以研發 (McPhail, 2002:220)。起初，網際網路的研發主要是為了解決軍方的一個重要問題，特別是在面臨危機和衝突時的通訊聯絡：如何透過電子將策略性的資訊傳送到遠方，而且可以保證正確與抵達目的地呢？(McPhail, 2002: 219)。在美國軍方將網路的研究成果與應用釋出，並且

³ 此類研究時大都採用社會調查研究法 (Social Survey Methods)，瞭解民眾對戰爭的態度究竟是支持或者反對，此類研究大都缺少民族誌的研究 (Ethnographic Studies)

⁴ 主要的研究包括：探討新聞記者報導戰爭新聞的例行性本質，媒體與軍隊、政府和其它成員在戰時的關係，以及戰爭報導的經濟情境等。

⁵ 在這三種取向中，此一取向較少，但已逐漸累積中。戰爭的文化研究將戰爭視為是一種有意義的社會活動，也是一種流行文化的一部份。

在 1990 年代中期被商業化後，網路在民間的使用快速的蓬勃發展。以新聞為例，起初，網頁只被視為是另類替代的新聞來源，然而現今卻已成為主流的新聞來源之一（McPhail, 2002: 222），並且已逐漸超越傳統的媒體。

網路的出現究竟為社會帶來了危害或者利益是一直不斷的在論辯中，網路樂觀主義者（cyber-optimistic）（如 Rheingold, 1995; Toffler and Toffler, 1995; Dyson, 1998 等）都主張，網際網路提供了獨特且令人樂觀的機會來改善社會，特別是在公共領域的政治參與方面。網路懷疑論者（cyber-skeptics）（如 Davis and Owen, 1998; Norris, 2000 等）則抱持著懷疑的態度，認為只是在強化現狀。至於悲觀主義者（cyber-pessimists）（如 Wu and Weaver, 1996; Galston, 2003）則主張網際網路會對民主體制造成危險，有潛在的可能性會對社會資本與社群聯繫造成負面的影響。

Holmes（2005）歸納第一媒介與第二媒介的主要差異包括：少對多 vs. 多對多的傳播、單向 vs. 雙向傳播、受政府管制 vs. 不受政府管制、不平等的政制體制 vs. 民主化、零散的使用者 vs. 自主的參與者、意識的影響 vs. 個體的體驗。

第一媒介時代是屬於制式化的所有權與控制權，傳播者的守門人角色極為明顯，然而第二媒介是屬於互動性的社會，是以數位化、網路整合的多元性傳播模式為基礎的傳播系統（Castells, 1996:374）。Holmes（2005:13）則認為，第二媒介時代不是新世代的轉移，而是一種傳播的整合形式，在其中並沒有新的事物，而是廣電媒介、印刷媒介與網際網路等傳播媒介的共存。互動與數位化將傳統的舊媒介重新加以改造（Van Dijk, 1999）。Flew（2002:10-11）主張，數位化使媒介間相互運用與平台化，並且進行網絡化。

在所謂的第二媒介時代中，經常被提及的一詞是匯流（convergence）。匯流的觀點牽涉到產業、媒介與個人化媒介科技等三種的匯流（Holmes, 2005:64）。媒介科技的匯流是這三種匯流的基礎點，涵蓋基礎結構（傳輸的連結，如衛星、光纖與微波等）與傳輸工具（如網路的電視與廣播等）。

數位傳播科技與接收過程中包括：內容來源、訊號處理、傳輸方式與接收、訊號處理、家戶設備等過程（Grimme, 2002）。在此一過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媒體實體產品的數位化，以及傳輸方式與接收。傳統媒體實體產品的數位化是此一過程中的內容來源。數位內容具有四項優點：精確，大量複製也不會失真；可以壓縮與大量儲存；可以採加密處理，以限制接收對象；數位資料具有通透性，可以隨時再使用，並且在數位通路或載體上被呈現（謝奇任，2005）。在數位時代中，傳輸方式與接收的特色是媒體科技的匯流。匯流是指舊的傳統媒體（如報紙、雜誌、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廣播等）與新媒體（電腦與網際網路）的結合（謝奇任，2005；Lawson-Borders, 2003）。

二、傳播學術典範的轉移

上文已指出，軍事傳播學的涵蓋範圍之一是軍事新聞學，且由於軍事新聞學的發展早於軍事傳播學，因此，對於新聞學典範的轉移也有必要進行檢視。

（一）新聞產製典範的轉移

Tumber 與 Prentoulis (2003:228)指出，我們正持續目睹新聞學典範的轉移：從不涉入 (detachment) 轉移至涉入 (involvement)、從確認 (verification) 轉移至主張 (assertion)、從客觀至主觀。

這種新聞學典範的轉移可以從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一些新的名詞出現，可以略窺一二，如資訊式新聞學、新新聞學、公民新聞學、公共新聞學、政治性新聞學、鼓吹新聞學、交談式新聞學、參與式新聞學等 (胡光夏，2008)。

新聞產製的理論取向可以分為四種：功能主義、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現象學 (phenomenology)、文本研究 (textual studies) (Schudson, 1991; Ferguson and Golding, 1997)。

功能主義是屬於行政性研究，將媒體描述成是一個大社會系統中的一部分，大多數的研究是採取內容分析或是量化研究方法，少數則採取質化研究法如參與觀察法等。功能主義原先是採取所謂「守門人」(gatekeeper) 的概念，來探討新聞媒體的守門過程。在 1960 年代後期與整個 1970 年代期間，功能主義的傳統開始受到批判與質疑，不同的理論典範開始出現，而這些新出現典範的共同特點是強調新聞「產製」(production) 的概念，也就是主張新聞是「製造」出來，而非如功能主義般強調是客觀存在，等著被媒體守門人來加以發現。

在網際網路出現後，最值得注意的是出現了網路新聞學 (online, internet, or cyber journalism) 與公民新聞學 (citizen journalism)。

網路新聞學提供了替代觀點、情境與意識型態的多元性報導，提供了使用者來自全球的不同報導 (Allan, 2006:105)。此類網站鼓勵公共的對話與爭辯，並且積極的參與提供「新聞」。由於傳播科技的發展，使得攝影與採訪等都極為方便，樂觀者主張，人人都可以成為記者，使得公民新聞學的概念也開始受到重視。有些專門的網站鼓勵民眾上傳所見所聞，如 indymedia, ohmynews 與 wikinews 等網站 (Allan, 2006)。而這類民眾參與的新聞也被稱為參與式新聞學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具有提供新聞資訊性質的網路部落格也是另一個受到矚目的現象。有人認為部落格本身就是屬於新聞學的一部分。新聞部落格是一種新型態的「共享式新聞學」(participatory journalism)，藉由個人主動地參與了新聞訊息的蒐集、分類整

理、分析、報導與傳佈 (Lasica, 2003; Wall, 2004)。新聞部落格所展現出來的是非正式的交流、平等參與主義、主觀的觀點與寫作的多樣化等 (謝奇任, 2006)。

與軍事新聞研究有關的是戰爭部落格 (warblogs) 的出現。戰爭部落格的參與者包括：新聞媒體組織、新聞工作者、獨立個人與團體組織等 (胡光夏, 2007)。戰爭部落格是在 2001 年 911 的恐怖攻擊之後開始出現。此類部落格宣稱是在對恐怖宣戰 (war on terror)，主要是提供主流傳播媒體所無法擔負的職責，那就是告知民眾可能的風險、威脅與危險 (Allan, 2006)。在 2003 年美國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前，戰爭部落格的主要論爭可以劃分為兩種的立場，支持或反對美英兩國對於中東地區的介入立場。這些部落客 (blogger) 有些是兼具傳統媒體的新聞工作者身份，有些則是獨立的新聞工作者 (solo journalist)，為網路媒體、印刷媒體或廣電媒體採編新聞。這些新聞工作者能夠迅速在戰地前線快速的移動主要是憑藉著移動的通訊科技 (mobile technologies)，如筆記型電腦、數位相機與攝影機、影音電話與小型的衛星通訊碟等裝備。

以戰爭部落格為例，傳統戰爭報導與部落格報導的最大的差別是：認可 vs. 不受認可、精煉 vs. 原始、客觀 vs. 主觀、第二手資料 vs. 第一手資料、依附 vs. 獨立、包裝過 vs. 幕後、保持距離 vs. 連結在一起、由上而下 vs. 互動性、演說性 vs. 會談性 (Matheson and Allan, 2006)。網路新聞學與傳統新聞學的主要差別是在媒介的應用上，但在屬性上則兼具了傳統平面媒體與電子媒體的特性。在新聞的定義上，也呈現多元性，不再只是侷限於傳統媒體機構記者所撰寫的新聞 (胡光夏, 2007)。

至於部落格方面，也不斷的在進化，由使用者端所產製的報導愈來愈多樣性，如移動部落格 (moblogging)⁶、照片部落格 (photoblogging)、影片部落格 (video blogging)、影音部落格 (audioblogging，以 MP3 或 MP4 的型式呈現) (Allan, 2006:172)。

(二) 傳播學研究典範的轉移

Miege (陳蘊敏譯, 2008) 將傳播思想或典範的發展過程區分為三個時期：奠基期 (1940 年代至 1960 年代)、研究問題的拓展期 (1970 與 1980 年代)、以及當前的爭議期。儘管 Miege 是從 1940 年代開始論述傳播思想的發展，但他特別提到，在西方，有些傳播問題的探討，甚至從希臘時期就已經開始了。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別提到在 1927 年由拉斯威爾所發表的一篇名為〈政治宣傳的理論〉的文章，此一文章將政治宣傳納入其主要的分析框架中。由此可知，傳播思想的發展與宣傳、民意有著非常密切的關聯性。

⁶ 移動部落格是指使用電話或其它移動的配備。

從軍事傳播學的角度而言，傳播主體是政府與國防軍事單位，也是以民意與宣傳等有著緊密的關聯。以美國為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策劃了許多的宣傳活動，也因而產生了許多的宣傳家，這些人員包括公共關係顧問、宣傳人員與募款專家等，都是屬於民意的塑造者（王石番，1995）。這類民意研究與宣傳活動的結合，奠定了日後宣傳與說服研究等大眾傳播理論研究的基礎。因此，對於民意研究的發展歷程也要有所瞭解。王石番（1995）將民意研究的歷史區分為萌芽期（1934年以前）、成長期（1935年至1950年代）與成熟期（1960年代迄今）。

在萌芽期的階段中，民意學者已瞭解到宣傳是戰爭與外交政策的武器，也是內部控制的一種工具，其研究範疇包括了領導統御心理學、官兵關係、心理作戰、國際宣傳戰與心理戰等方面。在成長期的階段中，由於民意調查的技術與闡釋等都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因此提供了遂行國際宣傳與心理戰略的良好依據，研究的領域主要聚焦於民意與外交政策、心理戰等方面。在進入成熟期後，研究就愈來愈多元化與紛歧化。

Miege（陳蘊敏譯，2008）所檢視的奠基期理論主要包括：控制論模式、大眾傳播媒介的功能主義取向、結構主義方法在語言學中的應用。

提出控制論的主要學者包括：Weaver 與 Shannon 的傳播數學理論與 Norbert Wiener 等人。Weaver 與 Shannon 所提出的理論與模式是較為人所熟知的，而 Wiener 則是較為陌生。他是一位數學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主要工作是解決與軍事戰略有關的問題與操作性的研究。

大眾傳播媒介的功能主義取向的主要研究學者是來自於政治學、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領域的學者。早期的主要代表的人物包括：拉查斯斐、賀夫蘭與拉斯威爾等。功能主義的主要的理論包括：宣傳與說服、兩級傳播、民意、議題設定、沉默螺旋、涵化理論等。控制論模式與功能主義取向研究有兩個根本上的差異（陳蘊敏譯，2008）。首先，控制論模式強調循環模式，功能論則是著重在原因與效果⁷；其次，控制論者對於社會整體訊息的流通感到興趣，而功能主義者則思考大眾傳播媒介在社會中的角色與影響。

結構主義的方法為於傳播研究的影響主要在三個方面（陳蘊敏譯，2008）：首先，不再從傳播者的角度出發，而是從傳播的文本（text）著手，從事文本的敘述結構分析；其次，跳脫傳統語言學的研究範疇，也對傳播的視覺訊息進行研究；最後則是對自動化訊息研究的關注，也就是特殊化的訊息領域。

研究問題的拓展期所出現的理論與典範則開始呈現多元性與紛歧性。主要的

⁷ 早期是藉用社會心理學的刺激與反應模式，但後來進行了修正，不再著重在以行為改變為主要效果的論述，而將研究的焦點關注於態度與認知等長期的效果。

理論思潮包括：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傳播的語用學、傳播的民族誌、科技與中介社會學、訊息的接受與媒介使用的形成、傳播哲學、文化研究、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等。

至於當前的爭議期方面，主要是延續研究問題拓展期的研究議題所進行的檢視，特別是有關資訊社會或網際網路社會的相關傳播議題。

Barr (2000:117) 在其著作中曾指出，從網際網路在全球的快速成長，獲得人們的熱烈的支持，但在此同時，也對於未能解決的問題感到困惑，因此，吾人可以視網際網路是一種典範的轉移。

三、傳播學術典範轉移對軍事傳播學研究的啟發

傳播研究可以分為學術性與應用性研究。同樣地，軍事傳播學研究也可以區分為這兩種研究。

(一) 應用性研究

應用性的研究主要是能將研究成果用於軍事傳播的實務工作。在數位的時代中，隨著軍隊事務的革新，如何妥善與有效運用網際網路來推展各項軍事傳播工作，是一個值得思考，且頗為急迫的問題。

在分析網路媒介時，對於不同的組成要素的檢視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這些組成要素包括網頁內容、電子郵件、線上論壇、部落格 (blog) 與播客 (podcast)⁸等 (Oates, 2008)。根據統計顯示，到 2007 年為止，全球上網總人口數已經達到 11 億多 (Oates, 2008:157)。

隨著學術研究典範的轉移，軍事傳播者不能再以傳統的由上而下的傳播模式與效果論來作為分析的架構。在數位時代中，對於傳播者、網路內容、接收者、媒介通道的匯合等議題，軍事傳播者都要考量到網路的多元性、共同參與、快速流動性與互動性。

儘管數位時代的軍事傳播者已不再侷限於政府的國防部門、軍隊、軍事單位或軍行所進行的傳播，而是在網路上傳播軍事資訊和提供服務的任何人，但兼負國防使命的國軍與國防單位仍應主動提供第一手資訊，透過全球資訊網、電子郵件、部落格、新聞群組、網路聊天室等，並且積極與民眾互動。

在網路內容方面，絕大多數的資料都是屬於數位資料，數位資料具有精確不失真、可被壓縮與加密處理等特性外，更具備有即時性、豐富性、多樣性、個別

⁸ 播客有的譯為個人廣播電台，是指在一個特定的網路位址中所匯集的數位檔案，通常是以影音為主 (Oates, 2008: 160)。

性與超文本等（謝奇任，2005）。軍事傳播者應考量將原有大量的紙本或類比資料逐漸加以數位化，並研究如何將這些資料匯合與運用，以利針對不同的傳播對象來選擇傳播的訊息。特別是在數位內容的匯流下，聲音、文字、影像等內容的製作，必須考量到匯合。

在傳播媒介的通道上，麥克魯漢（Marshall MacLuhan）主張媒介是人的延伸，都是在擴展人體的身體功能。例如，電視就是人的眼睛的延伸，廣播與電話是耳朵的延伸，而網際網路則是人類神經系統的延伸。在以電腦為基礎的數位時代中，傳播媒介具有混合性、非專屬性、互動性、兼具私人與公共性、管制程度較低、相互連結等特性（謝奇任，2005）。軍事傳播者必須要有系統的進行研究，必須進行傳播媒介的匯流，使得傳統的報紙、雜誌、廣播、電視與電影等媒介能夠匯合在以網路作為一個綜合平台的媒介，特別是移動通訊與傳播媒介的匯合，更是未來的趨勢。儘管媒介的匯合已是一種趨勢，但軍事傳播者仍應具有高度的機密敏感度，以確保軍事傳送與接收的安全。

至於使用者方面，傳統閱聽眾或接收者的概念，已逐漸被網路使用者、參與者或網民（netizen）等所取代。數位時代的網路傳送者與接收者間的界限已非常模糊不清。軍事傳播者絕對不能忽視網民的主動性，應對提供各種的互動性通道進行研究，以針對不同的傳播對象提供適當的互動機會。

（二）學術性研究

軍事傳播的學術研究仍屬於在發展階段中。中外大部份的研究仍以實證性的典範為主，利用內容分析法與社會調查法等社會科學的方法來進行研究。理論方面則包括議題設定理論、框架理論等效果理論為主。

在相關替代性典範的不斷出現時，可藉由後現代主義理論、女性主義理論、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民族誌、後殖民主義等，來檢視數位時代中的軍事傳播現象。藉由種族、性別、階級、離散、認同、恐怖等概念，可針對社會與文化層面等傳播現象，進行深入的檢視。

肆、數位時代下軍事傳播學研究的研究主題與面臨的挑戰

一、研究的主題

軍事傳播學由於是傳播學門下的一個次領域，在研究的範圍上，可以依據傳播的區分層級來加以細分。因此，依照傳播的層級，軍事傳播的研究範圍可以分為：人際傳播、小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公眾傳播與大眾傳播等。儘管此種區分方式有助於研究主題的尋找，但範圍仍然過大，且無法突顯出軍事傳播學研究的

重點與特色。

另一種區分是參考樓榕嬌等人所著（2005）的《軍事傳播：理論與實務》一書，可以將研究的主題區分為：公眾新聞傳播，包括發言人、記者會、軍事新聞文字傳播、軍事新聞電子傳播；作戰時期軍事新聞傳播，涵蓋戰地新聞處理、隨軍記者、軍聞工作與國家安全；語言傳播與運用；軍隊公共關係議題，檢視社區關係、危機傳播與不實報導等議題；軍事傳播與科技，分析網路傳播與網路新聞學等。

從上述的研究範圍區分中，與本研究較為相關的範圍是軍事傳播與科技。上文中已指出，美軍軍隊事務革新的最大特色是資訊化與數位化。在數位化的潮流趨勢下，軍事傳播研究的研究主題可以包括：軍事新聞網站的建構、軍事部落格與戰爭部落格、數位整合的媒體平台建構與內容研究、軍事網路的網路病毒與駭客攻擊、網際網路與宣傳戰、網際網路與心理戰、網際網路與軍事危機處理等。

二、面臨的挑戰

軍事傳播學研究所面臨的挑戰主要有三個：軍事傳播學的學門正當性問題、傳播的主體性問題、理論的適用性問題。

（一）軍事傳播學的學門正當性問題

一個學門的成熟與否主要是在於是否在大學的高等教育學府中有相關科系的設立、專門的學術研究機構與學會、以及學術期刊的發行等。

上文已指出，軍事新聞學在國內外已有相關的學系或課程，並且已有專書與相關的學術著作。而軍事傳播學的研究則是處於起步的階段。國內目前僅有一本由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聞系與世新大學新聞系老師所合著的《軍事傳播：理論與實務》一書而已。兩相比對，軍事新聞學比軍事傳播學來得成熟一些。

一般人或許會說，軍事傳播工作只不過是一門技術或技藝，只是將傳統傳播學的基本概念、理論與實務技能等，運用於軍事方面。在本質上，軍事傳播學是傳播學的應用，且其範圍較傳播學窄，既然有傳播學，又何必細分為軍事傳播學呢？如果軍事傳播學成立的話，未來是否會有更細的軍事傳播學出現呢？例如，軍事口語傳播學、軍事大眾傳播學、軍事組織傳播學等。

儘管可能有以上的這些種種的質疑，但世界學術研究的潮流趨勢是，日益朝著愈細部分工學門的發展與強調學門間的科際整合。再加上，有鑑於軍事傳播工作的發展與實際的需要，實在有必要為軍事傳播學門的發展，來奠定一些基礎。

（二）傳播的主體性問題

在數位的時代中，傳播者與接收者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這使得軍事傳播者

的主體性面臨了挑戰。現代傳播的專業分工通常將傳播者區分為四種類型(Bruce, 1992): 發言人或新聞傳播秘書、演講與文稿撰稿人、形象經營人、公共關係或危機傳播管理人。這種專業的區分是從大眾傳播的角度, 並且是以傳統媒體為主要通道來加以區分的。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 在數位時代中, 互動性、即時性與對談性是傳播的重要特性, 且傳播者本身也兼具接收者的角色, 誰是真正的傳播者已很難加以辨認。在此種狀況下, 以傳播效果為主要考量的軍事傳播主體(國防單位或軍事單位)很難有效的加以評估。此外, 網路社群的分散性與分歧性也都造成在研究上的難以掌握。

(三) 理論的適用性問題

傳統的軍事傳播研究大都借用大眾傳播理論、口語傳播理論、組織傳播理論、人際傳播理論、公眾傳播理論、公共關係理論與廣告理論等來進行研究。從軍事傳播者的角度而言, 主要關切的是傳播的效果、傳播的訊息、傳播的工具與接收者等的分析。這些研究歸納起來主要還是借用民意理論、宣傳與說服、議題建構理論、危機溝通理論等。在數位時代中, 這些理論的適用性與解釋力也面臨了要重新加以評估。具體的主要因素有二: 第一、這些理論都是以傳統大眾傳播媒介所具有的影響性與效果為基礎, 而在數位時代中, 閱聽眾已愈來愈分歧化與多元化, 因此, 相關理論的解釋力與適用性, 都可能需要重新加以檢證; 第二、軍事傳播研究是一個新興的領域, 由於在本質上, 更容易受到國際政治、外交等因素的影響, 使得所借用的這些理論也面臨到適用性的考驗。

值得一提的是, 隨著典範的轉移, 理論愈來愈多元化, 特別是後現代理論的出現, 對於以強調理性與邏輯性的現代理論已提出質疑與批判。在此一情境下, 軍事傳播學門如何藉由研究的累積來建構或修正理論, 都是從事軍事傳播的研究者要面臨的挑戰。

伍、結論

本研究採取文獻分析法, 主要在檢視數位時代下的軍事傳播學研究, 藉以描繪出軍事傳播學的定義、發展, 並分析傳播學典範的轉移對於軍事傳播研究所帶來的啟發。在資訊社會中, 訊息的數位化已愈來愈普及, 而處於此一情境下, 軍事傳播研究的當前課題有那些也是本研究的另一關注重點。

軍事傳播研究的起步較晚, 是從軍事新聞學逐步擴展而成。軍事傳播除了涵蓋傳統的軍事新聞學外, 還包括了公共關係、民意與國際關係等領域。基本上, 促成軍事傳播研究改變的最重要兩個因素是武器與通訊傳播科技發展。

由於軍事傳播研究是從軍事新聞研究發展而成，新聞學典範的轉移也帶來一些啟發。新聞學典範的轉移從報導立場的不涉入（detachment）轉移至涉入（involvement）、從確認（verification）轉移至主張（assertion）、從客觀至主觀。

傳播思想或典範的發展過程區分為三個時期：奠基期、研究問題的拓展期、以及當前的爭議期。在理論方面，從早期的著重在效果，逐漸出現多元的典範，包括詮釋學的傳統與批判理論等，使得傳播研究的主題擴展到了社會情境脈絡、文本、接收的分析等。這些不同的理論與研究取向不僅可以擴展軍事傳播的研究面向，更提供了分析的架構。

在數位化的潮流趨勢下，軍事傳播研究的研究主題可以包括：軍事新聞網站與部落格、數位整合的媒體平台建構與內容研究、軍事網路的網路病毒與駭客攻擊的研究、網際網路與宣傳戰、網際網路與心理戰、網際網路與軍事危機處理等。

軍事傳播研究所面臨的挑戰主要有三個：軍事傳播學的學門正當性問題、傳播的主體性問題、理論的適用性問題。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限制有三個。首先，本研究是採取文獻分析的方法，著重在概念性的探討，因此，比較缺乏實證性的資料作為論證的基礎。其次，軍事傳播學門是一個新興的領域，本研究屬於初探性的研究，相關的論述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最後，傳播的數位化仍在持續的進行中，本研究採數位化時代一詞仍有待商榷，因為有些人稱為資訊時代、後工業時代、後現代、第二現代等。

目前全球雖然遭逢經濟危機，但衝突與戰爭的危機仍存在著，特別是恐怖攻擊事件仍頻傳，且近期北韓試射「衛星」（或導彈）、以及核子武器試爆等，使世人擔心武器競賽是否會重演。在此種情境下，軍事傳播領域可以研究的問題相當的多。本研究已提出部分的研究方向，藉以拋磚引玉，期待未來能有更多的研究出現，藉以充實軍事傳播的研究，使此一領域能逐漸邁向成熟的學門。

參考文獻

一、中文

- 方鵬程 (2005)。〈導論〉，樓榕嬌等著，《軍事傳播：理論與實務》，頁 3-18。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 毛文戎、史文亭 (1988)。《軍事新聞學簡論》。長征出版社。
- 王石番 (1995)。《民意理論與實務》。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 王凱 (2004)。《數字化部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吳筱玫 (2003)。《網路傳播概論》。台北：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李瞻 (1972)。《新聞學》。台北：三民書局。
- 胡光夏 (2004)。〈網路新聞學發展的契機與轉機：第二次波斯灣戰爭中網路新聞報導之研究〉，《復興崗學報》，80 期，頁 15-42。
- 胡光夏 (2005)。〈廣播運用於政治與軍事衝突之研究：以兩次波斯灣戰爭為例〉，《復興崗學報》，83 期，頁 89-116。
- 胡光夏 (2007)。《媒體與戰爭：「媒介化」、「公關化」、「視覺化」戰爭新聞的產製與再現》。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 胡光夏 (2008)。〈衝突與戰爭報導的另類典範初探—和平新聞學〉，《復興崗學報》，92 期，頁 213-244。
- 倪樂雄 (2002)。《戰爭與文化傳統：對歷史的另一種觀察》。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盛沛林編 (2000)。《軍事新聞學概論》。北京：解放軍報出版社。
- 陳衛星譯 (2005)。《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思想與戰略的歷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陳蘊敏譯 (2008)。《傳播思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傅凌譯 (1994)。《新戰爭論》。台北 (Toffler, A. and Toffler, H. (1993). War and Anti-War: Survival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 童兵 (2000)：序言三，盛沛林主編，《軍事新聞學概論》。北京：解放軍報出版社。
- 葉德蘭 (2003)。〈傳播為和平之推手：論傳播學對和平研究之貢獻〉，《中華傳播學刊》，第 4 期，頁 215-245。
- 蔡繼光等譯 (2000)。《瞭解全球化：凌志汽車與橄欖樹》。台北：聯經出版社。
- 鄭貞銘 (1975)。《大眾傳播理論》。台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謝奇任 (2005)。〈數位科技與傳播〉，樓榕嬌等著，《軍事傳播：理論與實務》，頁 271-290。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二、英文

- Allan, S. (2006). *Online News: Journalism and the Internet*. Open University Press.
- Barr, T. (2000). *Newsmedia.Com.Au: The Changing Face of Australia'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St Leonards: Allen and Unwin.
- Baudrillard, J. (1995). *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 Bloomington, I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Brown, R. (2003). Spinning the Wa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Operations and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War on Terrorism, in *War and the Media: Reporting Conflict 24/7*, edited by D. K. Thussu and D. Freedman, pp. 87-100.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Carruthers, S. (2000). *The Media at War: Communic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Y: St. Martin's Press Inc.
- Castells, M. (1996).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1: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alden, MA: Blackwell.
- Davis, R. and Owen, D. (1998). *New Media and American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yson, E. (1998). *Release 2.1: A Design for Living in the Digital Age*. London: Penguin.
- Ferguson, M. and Golding, P. (1997). (eds.). *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 London: Sage.
- Flew, T. (2002). *New Media: An Introduction*.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lston, W. (2003).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Civic Life: An Early Assessment, I E. C. Kamarck and J. S. Nye (eds.), *Governance.com: Democ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Grimme, K. (2002). *Digital Television: Standardization and Strategies*. Norwood, MA: Artech House, Inc.
- Hallin, D. C. (1997). The Media and War, in *International Media Research: A Critical Survey*, edited by J. Corner, P. Schlesinger and R. Silverston, pp. 206-231. London: Routledge.
- Hiebert, R. E. (1995). Mass Media as Weapons of Modern Warfare, in R. E. Hiebert

- and C. Reass (eds.) *Impact of Mass Media: Current Issues*, pp. 317-326. NY: Longman.
- Hobsbawm, E. (1995).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London: Abacus.
- Holmes, D. (2005). *Communication Theory: Media, Technology and Society*. London and Thousand Oaks: Sage.
- Kamalipour, Y. R. (2004). Language, Media and War: Manipulating Public Perceptions, in *Global Media Go to War: Role of News and Entertainment Media During the 2003 Iraq War*, edited by R. D. Berenger, pp. 87-94. Spokane, WA: Marquette Books.
- Lasica, J. D. (2003). Blogs and Journalism Need Each Other, *Nieman Reports*, 57:3, pp. 70-74.
- Lasswell, H. (1927).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1, pp. 627-631.
- Lawson-Borders, G. (2003). Integrating New Media and Old Media: Seven Observations of Convergence as a Strategy for Best Practices in Media Organiz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edia Management*, 5:2, pp. 91-99.
- Louw, P. E. (2001). *The Media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London: Sage.
- Louw, P. E. (2003).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A Public Relations Challenge for the Pentagon, *Gazette: The Internal Journal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 65:3, pp. 211-230.
- Marwick, A. (1977). *War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wick, A. (1988). *Total War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Macmillan.
- Matheson, D. and Allan, S. (2006). Weblogs and the War In Iraq, in P. Golding and G. Murdock (eds.), *Unpacking Digital Dynamics*. Cresskill, NJ: Hampton.
-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Mentor.
- McPhail, T. L. (2002). *Glob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 Stakeholders, and Trends*. Boston, MA: Allyn & Bacon.
- Oates, S. (2008). *Introduction to Media and Politic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Poster, M. (1995). *The Second Media Age*. Cambridge: Polity.
- Rheingold, H. (1995). *The Virtual Community: Finding Connection in a Computerised World*. London: Minerva.

- Schudson, M. (1991) (2nd ed.). *News Production Revisited*, in *Mass Media and Society*, edited by J. Curran and M. Gurevitch. London: Edward Arnold.
- Toffler, A. and Toffler, H. (1995). *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The Politics of the Third Wave*. Atlanta: Turner Publications.
- Tumber, H. and Prentoulis, M. (2003). *Journalist Under Fire: Subcultures, Objectivity and Emotional Literacy*, in *War and the Media: Reporting Conflict 24/7*, edited by D. K. Thussu and K. Thussu, pp. 215-230. London: Sage.
- Van Dijk, J. (1999). *The Network Society: Social Aspects of New Media*. London: Sage.
- Virilio, P. (1989). *War and Cinema: The Logistics of Perception*. London: Verso.
- Wall, M. (2004). *Blogs of War: Weblogs as News*, *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 Criticism*, 6:2, pp. 153-172.
- Webster, F. (2003). *Information Warfa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in *War and the Media: Reporting Conflict 24/7*, edited by D. K. Thussu and D. Freedman, pp. 57-69.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Wu, W. and Weaver, D. (1996). *On-line Democracy or On-line Demagoguery: Public Opinion Polls' on the Internet*,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4, pp. 71-86.

(投稿日期：98 年 11 月 23 日；採用日期：99 年 5 月 28 日)

數位時代下的軍事傳播學研究